

利比亚的“革命民族主义”与国家现代化

韩志斌 李 铁

内容提要 卡扎菲夺取政权后,其“革命民族主义”是塑造利比亚民族国家形象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政治力量,它对利比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革命民族主义”激情下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加之缺乏适宜的外部环境,导致了利比亚的国家现代化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从而使“革命民族主义”主导思想陷入困境。伊拉克战争后,利比亚的现代化开始从激情四溢的“革命民族主义”向务实冷静的超越民族主义转型。

关键词 利比亚 卡扎菲 “革命民族主义” 现代化 世界第三理论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并行发展的两大思潮,二者对人类历史和国际体系的巨大影响,是其他任何历史力量所不能比拟的。利比亚的现代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史及“革命民族主义”激情的跌宕起伏:从奥斯曼帝国的无所作为到意大利的殖民行动;从大国的群雄逐鹿到塞努西集团的民族国家建构;从君主制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到革命性民族主义体制的系统构建;从传统部族集聚的落后国度到具有现代鲜活气息的文明社会。伊拉克战争后,利比亚的现代化开始从激情四溢的“革命民族主义”向务实冷静的超越民族主义转型。就此而言,对“革命民族主义”激情下利比亚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现实需要性,而且具有学理上的探索性。

一、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缘起

1969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趁伊德里斯·塞努西在土耳其度假之际,发动了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卡扎菲称这一天是利比亚真正独立的开始,并认为1951年的利比亚是“错误的独立”。¹ 自此以后,利比亚揭开了“革命民族主义”的序幕,利比亚的现代化走上了另一条历史道路。

按照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的论述,“革命民族主义”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形成于“分裂型”现代化,即现代化一般是在独裁政权崩溃后发展起来的,寡头或独裁政权失去了控制其现代化进程的能力;二是以抗拒社会作为新政权的基础,形成了倾向于现代化并较有内聚力的精英团体,他们能使有效的现代化模式与结构定型化;三是现代化的群体具有强烈的内部取向,精英一旦占据优势,就会强制性地推行自己的制度模式与变迁取向;四是较弱的国际取向,这是由革命所表现出的抗拒国际秩序的基本倾向所决定的;五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价值观方面中,民族主义精英的革命目标在于构建一种具有弹性结构的象征与集体认同,即在结构—制度这一层次上建立广泛而统一的行政机构、占支配地位的中央官僚组织,以约束与容纳各阶层的意志与利益。^④

¹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6.

^④ [以]S·N·埃森斯塔特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4—145页。

卡扎菲本人在他所著的《绿皮书》中再三强调推翻伊德里斯王朝不是一场军事政变,而是革命的起点。¹按照亨廷顿的阐述,革命是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准则和依托,即政治体制、社会结构、领导权以及政治活动与政策方面发生的一场迅猛的、根本性的、暴力性的内部变化。^④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政变并不能与革命划等号,政变本身仅仅是通过暴力改变领导权,也许改变政策,但并不一定会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准则。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政变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系统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性行为:在理论上体现为“世界第三理论”^④和《绿皮书》的出版;在实践上表现为民众革命、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具体实施;在外交政策上突出领导人的叛逆个性,挑战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因此,正如汉纳·阿伦特所说:“暴力与变化一样,都不足以形容革命现象;只有当发生的变化意味着另一种新的开端,暴力的使用是为了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国家之时……我们才能谈到革命。”^{1/4}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利比亚1969年的军事政变不是一场简单意义上的军事政变,而是社会革命,是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逻辑起点。

研究现代化的学者认为,革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手段,革命的原因在于现代化。也就是说,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不可阻挡的,当现有的社会框架无法适应变化的迫切性时,革命就会发生。^{1/2}现代化理论从社会转型的视野来解析革命的原因,超越了历史研究的传统视角。从现代化研究视角出发,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缘起有以下因素:

1. 利比亚内部(的黎波里、昔兰尼加、费赞)政治认同性不强,即现代性的凝聚力不强。随着利比亚君主制政治进程的展开,根深蒂固的部族认同日益浮现,政治权力结构沿着种族、教派界限出现断裂的可能性增大。同时,由于人们的部族认同强于国族、国家认同,部族等亚文化认同很容易直接转变成政治认同和政治旗帜。这样,政治动员就必然容易转换成部族势力的动员,部族利益直接转换成政治利益,进而形成一种“分裂型”的民族国家。塞努西集团将利比亚的主要财富都拨给昔兰尼加,对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地区投入极少,这种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各部族势力的离心倾向。

2 石油收入带来的社会财富暴增,在部族势力中分配失衡。在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一贯不把经济实力与财富作为获取政权的必要前提。古代阿拉伯人认为,财富不是政权的源泉而是政权的报偿。^{1/4}但当经济问题与政治及思想问题密切相联时,财富问题是难以回避的。由于商业性的经济系统的缺乏或者中央行政系统的干预,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利比亚仍然依赖于血缘联系的经济分配方式,缺乏雇佣式的商业经营模式。部族联盟和地方家族势力由于受国王青睐而担任国家要职。而且,石油财富并没有在广大民众中实现利益均沾,而是社会贫富分化,特别是一批政府官员因与塞努西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夜暴富。因此,利比亚的草根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卡扎菲本人就是中下级军官出身,政变的参加者大都属于来自乡村的草根阶层,与塞努西部族势力没有什么联系。^⑧

¹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86.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86页。

^④ “世界第三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建立一个以伊斯兰和阿拉伯传统为基础的,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即“伊斯兰社会主义”,这是其理论核心;二是人民政权、经济革命和社会改革;三是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非主义。

^{1/4}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63, p. 28.

^{1/2} 钱乘旦:《“革命”研究:革命的原因、性质和目的》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第151页。

^{1/4} 秦朵:《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宗教运动的复兴——伊朗和埃及二例的对比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第49页。

^⑧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79.

3 塞努西君主制代表了落后的保守力量,在社会转型时期成为现代化的阻碍元素。从理论上讲,在当时急剧变动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塞努西传统君主政治如要保持自身的长期稳定存在,关键在于国王能否把握时代变化的趋势与脉搏,对传统君主政治进行及时的自我调整。塞努西集团作为君主制的“母体”能够改造利比亚社会,却无法改造自己的传统基因,因此它最终会被后来的革命力量所替代。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君权范围越小,君主的权威不受损害地延续的时间越长。”^①伊德里斯王朝面对激荡澎湃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激流,并没有调整战略,而是做出抗拒的姿态。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具有摄人魅力的领袖人物只有通过在生活中表现力量才能获得和维持自身的权威。若想做先知,必须显奇迹;若想做军阀,必须立战功。”^②换句话说,领袖如果没有获得“魅力”的基础,群众又怎么会崇拜他呢?塞努西的亲西方政策便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导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正如卡扎菲所说:“民众怎能向一个允许外国人和外国士兵充斥本国的国王致敬,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想进入惠勒斯军事基地时,竟被拒绝。”^③

4 国际社会的外部打压。英国学者弗·哈利迪写道:“革命民族主义被证明是更多国际冲突的起源,使人们在更大程度上竞争性地关注于民族利益。”^④在“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架构内,利比亚与西方和美国之间的对抗与打压、挑战与应对成为当时国际体系的突出特征。卡扎菲早在1973年就提出“武装人民群众”的思想,对以色列和美国发动圣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卡扎菲被冠以“恐怖主义大师”的称号。1980年2月15日,美国关闭其在的黎波里的大使馆。1982年底,美国停止从利比亚进口石油,并抵制向利比亚出口高技术产品以及与恢复石油生产相关的设备。^⑤利比亚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处于低谷,甚至断交,因而成为美、英等国长期敌视的对象和打压的目标。1989年,美国证实利比亚支持了大约30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革命运动。^⑥卡扎菲挑战西方大国政府的合法性,也招致了西方政府对其政府合法性的挑战。

二、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与国家现代化的内涵

关于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研究现代化的学者认为革命的目标是实行现代化。弗·哈利迪认为,革命是一些落后国家的另一种现代化选择。^⑦亨廷顿也说:“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他的命题是:“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⑧毫无疑问,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结果或者目的是现代化,但利比亚的现代化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多步骤的进程,其现代化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由传统君主制向民族主义制度的转型。蒂利声称:“革命的结果是一批掌权者取代另一批掌权者。”^⑨很显然,他对革命目的和内涵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而没有看到革命的深层次内涵。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是一个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检验的系统工程,它与以前的塞努西王朝有着截然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和精神文化体系。

“9·1”政变成功后,卡扎菲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在利比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从1971—1973年间,他的想法逐渐明晰。1973年5月14日,卡扎菲在的黎波里举行的阿拉伯—欧洲青年集会上第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95页。

^②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p. 328.

^③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80.

^④ [英]弗·哈利迪著、张帆译:《革命与世界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⑤ P. Edward Haley, *Qadhafi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69*,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⑥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132.

^⑦ [英]弗·哈利迪著、张帆译:《革命与世界政治》,第25页。

^⑧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87页。

^⑨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p. 193.

一次提出他的“世界第三理论”。从 1976 年 1 月到 1979 年 3 月,卡扎菲陆续出版了三册《绿皮书》就“民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三方面做了阐述,系统地提出了实施“世界第三理论”的具体方案。根据卡扎菲提出的新理论,他对利比亚进行了空前的社会改造。卡扎菲主导的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现代化的内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直接民主的政治现代化。《绿皮书》第一卷《民主问题的解决方法——人民政权》既是卡扎菲“世界第三理论”的政治基础,也是其政治现代化路径的指南。他认为“世界第三理论”击败了西方的民主,因为西方的议会制度只表达议员的政治意愿,实际上剥夺了人民的权利;议会不让民众参与政治,却代表他们独揽大权,“他们往投票箱里投票,就如同往垃圾箱扔废纸一样”;¹即使政党因得到了 51% 的选票支持而获胜,但是这意味着还有 49% 的选民并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意愿。^④卡扎菲得出结论:迄今为止,只有直接民主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难题,因为直接民主实现了民众的平等主义,消除社会的阶层制度和等级体系,反映了部族原始平等的精神气质和固有风气。在利比亚,直接民主最重要的机构是民众选举代表组成的基层人民委员会(Basic People's Congress),他们监督和引导国家权力机构总人民大会(General People's Congress)。卡扎菲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2 农业革命的物质现代化。现代化一般总是与工业化、都市化等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很容易忽视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二战后,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农业的忽视而陷入发展的困难境地。一般来说,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经济发展最初是从“传统”的部门或依赖农业提供原材料的部门开始的。从实际的自然条件来说,利比亚并不具备农业发展的优势,但按照卡扎菲的“世界第三理论”,农业是利比亚实现民族国家独立的前提,也是建成现代化和多样化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

卡扎菲执政后,利比亚确定发展农业的一系列目标,并采取了相应的战略与对策。一是实现粮食自给。具体措施为:扩大农业垦殖区及农业用地;营造防护林以保护土壤免遭侵蚀,控制土地沙漠化蔓延;采用现代化技术挖掘生产潜力,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施行人工降雨,寻找新水源,防止地面水土流失。二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调动人力和资金的潜力。利比亚政府建立培训机构,向农民传授农业知识,培养技术人员;建立农业合作社、农业会议和农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提供技术援助和销售农产品为农民服务。三是摧毁部族土地所有制,实现社会正义。部族势力在利比亚社会广泛存在,一般垄断着土地与水源,利比亚政府通过在沙漠地区建立农村村社和实施生产计划,打破部族势力的垄断,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四是土地国有化。利比亚政府通过五种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1)为本国公民提供长期贷款以鼓励他们购买意大利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地。(2)剥夺意大利人占有的 38 万公顷土地,一部分分给农民耕作,另一部分由国家出资建立农场转交给农民或城市移民经营。(3)宣布未开垦的土地为国家所有,限制部族势力的私有土地。1970—1987 年,利比亚共开垦荒地 180 万公顷,耕地面积达到 264.1 万公顷,其中 46.8 万公顷为水浇地,占全部耕地的 17.7%。^④1977 年,利比亚政府制定法律对部族土地所有制做出限制,设定了开发与使用土地的条件。(4)防止私有农场面积过大,规定每个家庭只可拥有满足自身需要的土地。(5)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组织,包括私营农场、国营农场以及其他农业组织,通过互助合作、向国家贷款等方式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¹ 潘蓓英:《列国志·利比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102 页。

^④ Dik Vandewalle “The Libyan Janahiriya since 1969”, in Dik Vandewalle(ed), *Qadhafi's Libya, 1969–1994*, Maam ilan Press LTD., p 17

^④ 潘蓓英:《列国志·利比亚》,第 155 页。

3 石油新战略的能源现代化。在未发现石油以前,利比亚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笔下描述的利比亚地区是“一片载满沙土的广阔地面”。¹ 石油改变了利比亚的贫穷状态。石油为利比亚国家与社会生活带来了各种好处:一是提高了利比亚的国际地位。利比亚成为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后,立刻加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并在这些组织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二是利比亚的经济增长加快,国力增强,人民生活迅速得到改善。1951年,利比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5美元,1969年增加到2216美元,20世纪70年代末已居非洲国家首位,达到1万美元,全国实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④ 三是石油生产成为利比亚经济结构的主导产业。2007年之前,石油工业在利比亚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52.7%,石油出口额占国家出口总额的95%。利比亚国家财政收入的80%来自石油出口。^(四)

作为“革命民族主义”现代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利比亚实施了石油新战略。其要点是:国家对石油生产、勘探与企业的营销进行全面控制;石油企业劳工利比亚化;改变单一依赖石油资源的经济现代化结构;扩大产业结构,构建多元化的经济格局。

在石油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利比亚政府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利比亚政府修改、废除君主制王朝同外国公司签订的协定,增加保护石油资源的条款。第二,将境内的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国有化。利比亚根据1971年第115号法律,将境内的英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组建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1973年,利比亚将西方石油公司、埃索石油公司、利比亚美国石油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和德士古海外石油公司股份的51%收归国有。1974年,利比亚政府将美国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国有化之后,利比亚石油生产的73%被国家石油公司所控制,之前外国公司掌握了利比亚石油生产的90%。^{1/4} 第三,利比亚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以保护与充分利用石油资源:一是限产保价,即限制石油产量以保持油价不下跌,石油收入不受影响。20世纪80年代,利比亚同阿尔及利亚、伊朗、沙特、科威特等国协调立场,阻止“超产降价”。二是在陆地和领海进行勘探活动,实行“再度开采技术”,提高石油回收率,增加油田的开采效率。三是大力发展石化产业,改变石油单一出口的经济格局。

4 多元化发展的经济现代化。为了推进利比亚的现代化,利比亚政府投入巨资致力于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改变石油主导经济的格局,积极发展新兴工业,重点放在有色金属冶炼、采矿业、运输业、食品、纺织、服装、皮革加工等领域。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增强了利比亚企业的生产能力与出口能力,这些非石油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国家工业结构趋于合理,也调整与改进了国家产业结构的区域分布。第二,增加天然气产量,重视对天然气的勘探与开发、利用。利比亚的天然气储量丰富,总储量可达70万亿—100万亿立方英尺。2003年,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达46.4万亿立方英尺。利比亚政府试图以天然气替代石油作为国内能源,以增加石油及石油产品的出口量。同时,利比亚还吸收国外公司参与本国天然气的开发、利用。2002年10月,埃及出资100亿美元修建通往利比亚的输气管道。^{1/2} 第三,加速发展电力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非石油工业。电力工业是利比亚发展经济的基础产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居民日常生活提供廉价而洁净的能源。利比亚国有电力总公司计划到2010年前投入100亿美元用于建造电站、电网、全国和地区的输电控制中心。^{3/4}

利比亚的制造业包括食品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和电器制造业、钢铁联合企业、家具与造纸工业、纺织、服装和制革业等。1997年后,制造业逐渐有起色。由于石油收入的支撑,利比亚建筑业

¹ ④ Di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14, 97.

(四) 1/4 1/2 3/4 潘蓓英:《列国志·利比亚》,第127、130、137—139页。

迅速发展。1986年,建筑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在公共服务行业(石油部门除外)中名列第二。

三、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困境

“革命民族主义”激情主导下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建的愿景是美好的,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革命民族主义”主导思想的“意识形态性”及缺乏适宜的外部环境,使得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的现代化难以实现既定的目标。尤其是利比亚社会的部族结构性、“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性以及出现的相应问题,使得“革命民族主义”主导思想日益面临挑战。

1. 部族主义的回归和国家部族化。“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利比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动员和观念整合的任务。“革命民族主义”要求把民众的精力和认同集中到国家层面,但利比亚部族主义势力是难以消除的。这样,作为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效忠基础上的现代意识,“革命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扩散与利比亚根深蒂固的部族主义必然产生矛盾。卡扎菲“革命民族主义”的思想理念是反对部族主义的,建立民族国家与排斥部族国家是卡扎菲执政后构建“革命民族主义”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方面。但长期以来,由于利比亚社会中部族氛围浓厚,人们的国家观念淡薄,部落居民皆惯于通过部落酋长的权威形成一套权力体系和行为规范,只有部落酋长才能把他们动员起来。¹因此,卡扎菲在指责部族主义的同时,却不得不依靠部族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许多利比亚人看来,国家寻求稳定最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法就是回归到部族社会结构的状态,许多议员都以部族联盟的名义参加选举和提出治国安邦的策略。到1994年,革命委员会以及国家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大都从卡扎菲所属的卡萨斯发(Qathatha)等部族中产生。卡扎菲求助于部族主义,依靠强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做法在暂时巩固政权的同时,也使其政治体系具有部族政治的特征,这对于现代政治模式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这种状况使得利比亚很难超越传统部族社会的历史局限,对于利比亚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是非常有害的。

2 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对现代化的延误。国家资本主义“本身是经济学使用的一个学术术语,指的是政府利用国家力量集中社会资源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与垄断性工业经济的政策”。^④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开始对长期实行的、以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府高度干预下以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试图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经济开放的基础上,恢复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利比亚政府却背道而驰,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取向日益增强。其原因有三:一是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两种思潮均强调政府对发展的指导作用,忽视或否定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有益作用。在对外贸易交往层面主张与国际市场脱钩,要求新独立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④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利比亚国家还认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剥削现象,因而私营经济在利比亚发展缓慢,而国家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二是在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政权看来,发展市场经济、推行经济自由化会在无意中削弱民族主义政权的权力基础,而国家资本主义则通过经济手段巩固了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因为市场经济主体根据市场信息变化可以独立做出决策,而不再一味听从国家的指挥;市场经济还造就了庞大的追求教育、自治权、个人自由、财产权和参与政府事务的中产阶级。^Ⅳ同

¹ Mansour O. El-Kikhia, *Libya's Qadhafi: The Politics of Contradiction*,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p. 26-27.

^④ Dirk Vandewalle, "The Libyan Jamahiriya since 1969", in Dirk Vandewalle (ed.), *Qadhafi's Libya, 1969-1994*, p. 28.

^④ 赵国忠主编:《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96页。

^Ⅳ [美]罗伯特·达尔著,李柏光、林猛译:《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6页。

时,大众的开放和自信会使“革命民族主义”的强制治理方式变得困难与危险。三是联合国和美国的制裁不仅使利比亚在国际社会中空前孤立,还使其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极大困境。在这种状况下,国家资本主义可以使利比亚政府控制有限的资源以保证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1979年,利比亚颁布了题为《长期计划的发展前景、问题和政策,1980—2000》的新发展计划,标志着利比亚国家资本主义的增强。该计划反对私有制,要求废除私有部门。1980年3月,卡扎菲政府决定废止使用利比亚第纳尔货币,这意味着将个人财富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¹ 1990年以后,利比亚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更为明显。国家主导了所有的制造业、农业、零售业、银行保险等。国家贸易公司控制了工业、农业与制造业的进口权。其直接后果就是经济现代化从属于政权巩固的大战略,导致现代化目标的模糊与偏离。具体表现为对农业工程盲目投入,但效果不佳。^④ 石油产业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相对有限,而且获取石油致富之易,也使利比亚政府发展其他产业缺乏动力。

3 利比亚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担负着发展经济、富国强民及维护政治独立与国家安全的双重使命。从理论上说,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和平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但从利比亚特定的国情来看,二者还是矛盾的。“革命民族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使得利比亚为抵抗美国和支持恐怖主义,将国家财政大都投入到国防预算中。而增加军事开支,必然相应减少经济发展的投入。这也是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难以回避的两难选择。其后果一是造成国有企业资金投入不足,国家无暇顾及企业的科学管理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造成效率低下。二是“革命民族主义”的激情使利比亚政治精英将注意力集中在构建强大的军事力量上,忽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三是黑市交易猖獗。在利比亚政府牢牢控制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的情况下,黑市交易虽有风险但却可赢取厚利。在利比亚,边境走私和国外劳工携带大量商品到利比亚贩卖是黑市交易的主渠道。由于利益的诱惑,甚至连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也沉溺于黑市交易。四是利比亚政府忽视本国国情,盲目接纳国外移民以迎合“革命民族主义”的旗帜,造成失业现象严重。1997年,利比亚政府接纳了200万非洲移民后国内失业人数剧增。2003年,利比亚失业率高达30%。^(四)

四、余 论

“革命民族主义”是塑造利比亚民族国家形象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政治力量。它曾以激昂的革命热情和义无反顾的武装斗争赶走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实现了利比亚的独立梦。在“革命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卡扎菲对利比亚进行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其对推进利比亚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和考虑,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和强制性,并在诸多方面背离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加之因缺乏适宜的外部环境而日益陷入备受孤立的窘境,因而使利比亚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无法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可以说,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政权力图把合法性建立在现代化政绩基础之上,但一系列发展困难使之陷入难以摆脱的“政绩困局”之中。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现代化投入巨大,规模宏大,但效果甚微,“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

¹ ④ Dirk Vandewalle, “The Libyan Jamahiriya since 1969”, in Dirk Vandewalle (ed.), *Qadhafi's Libya, 1969–1994*, p. 28, 29

^(四)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186

法性”。¹

伊拉克战争以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美国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利比亚开始由挑战国际体系向认同世界秩序的方向转换。“9·11”事件后,卡扎菲谴责恐怖主义,认为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是自卫行为,塔利班是“政治伊斯兰的推动者”。^④ 2003年8月,利比亚政府同意支付27亿美元作为对洛克比空难受害者家属的赔偿。^⑤ 同年12月20日,卡扎菲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政府随之解除美国公民到利比亚旅游的禁令。2004年3月,利比亚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并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说:“我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应该往前走,接受利比亚返回国际社会符合我们的利益。”^⑥

2005年1月,卡扎菲的儿子赛伊夫·伊斯兰·卡扎菲在达沃斯会议上宣布了利比亚的改革计划。他说:“旧的时代已经过去,利比亚将迈向现代化的新阶段。”^⑦ 他的发言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利比亚将改变以前的“革命民族主义”,构建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其主体内容包括推行私有化、引进外资、改革派主导政治体系等。^⑧

从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演变可以看出,利比亚现代化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历史过程:在经济上,从主张公有化到推行私有化;在政治上,从排除部族到依靠部族;在外交上,从极端仇视西方和美国到靠拢并接近西方;在治国理念上,从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到务实主义。作为“革命民族主义”的倡导者,雄心勃勃的卡扎菲在过去的30多年里既没有促成阿拉伯民族的大一统,也未将利比亚改造成伊斯兰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略显残酷的现实是利比亚治国方略转变的直接动力。这种演变也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变迁和中东“强人政治”的危机,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是“魅力平凡化”的过程。在中东政治生态中,强人政治现象十分普遍。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和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完全凭铁腕和魅力赢得民众认同、推进政治变革、寻求制度合法性就显得日益艰难。因此,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来说,利比亚现代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伊拉克战争只不过提供了一股强大的外动力。从现代化转型的客观结果来说,它使利比亚融入了久别的国际社会,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维护了利比亚国家的根本利益。

Abstract After Qadhafi seized the political power in Libya,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ce in shaping the nation-state and greatly promoted the state modernization process. However,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building of Islam socialism under the passionate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is mostly out of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and both its obvious Utopian tendency and the lack of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lead to the failure to realize the state modernization objectives and the predicament of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After the Iraqi war, the state modernization in Libya began to transform from the passionate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to the practical and sober beyond nationalism.

(韩志斌,副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李铁,讲师,西安文理学院外语系,西安,710069)

[责任编辑:吴家多]

¹ [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59页。

^④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180.

^⑤ ⑥ ⑦ Lany Luxner, “Libya: Game on”, *The Middle East*, October 2004, p. 36-40.

^⑧ 韩志斌:《后冷战时代卡扎菲思想的变迁》,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第108—111页。